

# 非洲文学背负的“语言之殇”

柳青

## 观点提要

在欧美大学的文学系，“非洲文学”通常隶属于英语系或法语系。非洲当下最有影响力的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昂戈，曾撰文谴责19世纪欧洲人的到来“肢解了非洲大陆的文化和民族语言”，为了抗衡“用欧洲语言定义自我”的非洲文学，他渴望看到“用非洲语言写作的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他自身也致力于用家乡方言基库尤语写作。然而耐人寻味的是，非洲大陆上、尤其撒哈拉以南的国家拥有数量众多的语言，如果一个作家选择本土语言来表达，意味着他的作品只能传达给很少的受众。而选择英语或法语写作的非洲作家，相对能接触到国内外的更大读者群，作家的声音被带到更远的远方和更多人中间。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出生在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岛，在伦敦完成学业，从1987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他用英语写作。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是沃莱·索因卡，他是尼日利亚人，毕业于英国利兹大学英语系，他在尼日利亚用英语从事戏剧创作，被称为“非洲的莎士比亚”。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是阿拉伯语文学的代表人物。莱奥波德·塞达·桑戈尔是非洲现代诗歌的奠基人，他是用法语写作的。近年始终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之一、也是非洲当下最有影响力的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昂戈，大学就读于英语系，以英语写作进入东非文学界，但是，当他以文学新人的身份参与“非洲作家大会”，却发现斯瓦西里语、约鲁巴语、阿姆哈拉语等大量非洲当地语言的作品被排除在外时，出于抗争意识，他决定转向用肯尼亚老家方言基库尤语写作。

语言，是了解和讨论“非洲文学”时一个无法回避的复杂议题。恩古吉·提昂戈在1980年代中期发表过一篇措辞尖锐的文章，谴责欧洲列强“肢解了非洲大陆的文化和民族语言”，导致“非洲文学用欧洲语言定义自我”，在这篇文章中，他甚至对阿契贝和桑戈尔发出质疑。提昂戈呼唤“用非洲语言写作的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固然是渴望文化自信的表达，但有必要意识到，非洲大陆上的多样化民族语言长久只有口语的形式，8世纪伊斯兰移民带去阿拉伯语，19世纪的欧洲人输入英法葡语系，外来的文字系统让当地的民族语言发展出书写形态，甚至，外来语言成为不同部族之间的通用语。仅仅透过“语言”窥视口，我们就可以窥见到非洲的作者和他们的写作怎样卷入历史、政治、社会变革的骇浪中。

## 黑色大陆的文学寻根

出生在加勒比海地区马提尼克岛的

非裔作家弗朗茨·法农在《论民族文化》一文中提到，为了回击种族主义者的嘲笑，非洲的知识分子们爆发了文化寻根的热情，来证明这块黑色的大陆曾有过美丽绚烂的时代——“他们怀着巨大的愉悦发现，他们的历史都是尊严、荣耀和庄重”。早在公元前，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闪米特移民越过红海，来到埃塞俄比亚西北部的察湖附近定居，移民带来塞巴语字母系统，和原住民的语言融合。在公元4世纪，埃塞俄比亚基督教教会成立，僧侣们用当地语言盖兹语翻译福音书，从希腊文译入包括《圣经》在内的宗教典籍，并创作一种叫作“祁奈”的赞美诗，这是盖兹语最重要的文学成就。公元10世纪以后，衰败的阿克苏姆王朝从南方的埃塞俄比亚高原迁移到北部的阿姆哈拉地区，从此，阿姆哈拉语流通，盖兹语成为非洲的拉丁语，仅用于学术文本。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里，阿姆哈拉语文学的体裁限于歌颂统治者的战歌和赞美诗。到了19世纪末，埃塞俄比亚皇帝面对欧洲的威胁，意识到要对国家进行全面的现代化变革，包括文学创作，皇帝支持阿姆哈拉语创作诸如小说和戏剧等欧洲舶来的文学形式。埃塞俄比亚在20世纪上半叶被意大利占领且卷入二战，这对本国文学发展造成毁灭性打击。直到战后，意大利军队战败撤离，阿姆哈拉语文学再度繁荣，其后涌现大量的小说和戏剧。

在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沿岸地区、沿海岛屿，阿拉伯半岛的移民和原住民黑人产生文化交融，这种混杂的文化在当地班图语的基础上掺入阿拉伯语元素，形成特色鲜明的非阿拉伯语言——斯瓦西里语。最早的斯瓦西里语手稿追溯到18世纪，内容以宗教题材的史诗为主，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语诗歌集有大量重合。到了19世纪，一个叫穆亚卡的作者写诗声讨阿曼苏丹强加于肯尼亚蒙巴萨地区的宗主权。后世的文学评论家认为，这位穆亚卡把斯瓦西里语诗歌带到民间，开启世俗题材的创作，用文学去记录、回应和评价政治历史事件，书写当代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在英属

东非地区推广斯瓦西里语为官方通用语，这种曾经使用阿拉伯语文字系统的语言从此转为使用罗马字母。欧洲的文字样式——尤其小说——也在这个阶段被引入斯瓦西里语。坦桑尼亚独立后，既是政治家也是学者的朱利叶斯·尼雷尔，他用斯瓦西里语翻译了莎剧《朱利乌斯·恺撒》和《威尼斯商人》。在他执政期间，斯瓦西里语成为坦桑尼亚的官方语言，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斯瓦西里语研究中心改造了这门语言，使之适于表达和传播，这激发坦桑尼亚的新生代作家们用斯瓦西里语创作大量探讨时代议题的原作品。

在西北非，公元8世纪起，陆续有穆斯林迁往撒哈拉以南，到了11世纪晚期，撒哈拉以南的西非大部分黑人皈依伊斯兰教，此后直到18世纪末，阿拉伯语是这一地区书写艺术唯一的媒介。位于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的历史名城廷巴克图在14-16世纪是伊斯兰学术中心，但是1591年摩洛哥人征服廷巴克图之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一蹶不振。18世纪中晚期，从欧洲奔赴当地的神职人员为了在中低社会阶层中传播教义，用民众的语言进行教学和布道，并延伸到摸索本土语言的书面形式，豪萨语从此取代阿拉伯语。直到今天，在豪萨语地区，大部分作家坚守地方语言，《尼日利亚语言》是豪萨语的重要文学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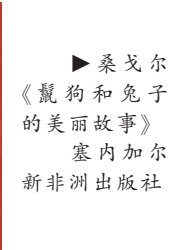
## 被欧洲文学推动的阿拉伯叙事

对比东、西非，北非可说是被阿拉

▶马哈福兹《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上海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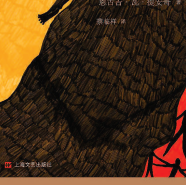


▶桑戈尔《鬣狗和兔子的美丽故事》塞内加尔新非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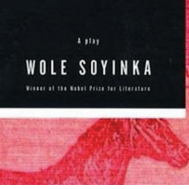


▼索因卡《死亡与国王的侍从》W.W.Norton出版社

▶阿契贝《非洲的污名》南海出版社



▶提安哥《大河两岸》上海文艺出版社



## 从历史走向现实的“文化混血儿”

撒哈拉以南国家拥有数量众多的语言，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并不顺畅，流通最广的是外来统治者推广的语言，或外来者的语言。如果一个作家选择本土语言来表达，那么他的作品只能传达给很少的受众。选择英语或法语写作的非洲作家，反而相对能接触到国内外的更大读者群，作家的声音可以被带到更远的远方和更多人中间。在20世纪上半叶，为了唤起非裔的族群认同感，以“非洲共同体”为信念的大量作品，是通过欧洲语言表达的。

当桑戈尔被问“为何以法语写作”时，他回答：“我们是文化混血儿。我们的词语包裹着树和血液的味道，而法语词汇闪耀火光，熊熊火焰照亮我们的黑夜。”桑戈尔以法语写作超现实主义诗歌，他认为这种表达形式所传递的高强度节奏、形象和象征，呈现了非洲人的创造性，把非洲黑人的文化信息传达给外部世界，这是被包装在文雅形式中的抗议。一件欧洲的工具被技艺娴熟的非洲人掌握，这使欧洲社会意识到黑人民族具有同等的人性和尊严？还是进一步陶醉于“非洲精英被欧洲文化同化”？在轰轰烈烈的族群认同运动翻篇后，这个暧昧的争端成为长久嵌在非洲文学机体内的芒刺。西非法语区的超现实主义诗歌很

# 博弈与书写：一次丹麦文学史上的试验

——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影片《信誓》

娄白杨



《信誓》海报和剧照



《信誓》是著名丹麦导演比利·奥古斯特的新作。纵观这位已在影坛活跃四十余年的导演的创作轨迹，始终对剧本给予充分的重视，并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将影像与文学相互编织、在改编中阐发出从文本到形式的多重光彩。影片改编自丹麦诗人托基尔德·比约维格的同名回忆录，是对丹麦文学史上一段重要往事的倾情再作。简洁的影像方式、有所隐匿的叙事与激动人心、错综复杂的故事内核产生了对比，犹如拉紧的两只手，在重心向两端起舞的结构中达成了平衡。

## 丹麦文学史上的重要线索

托基尔德·比约维格这一出版后即引发轰动作品的讲述了他与丹麦国宝级作家凯伦·布里克森之间的故事。凯伦最著名的作品是《走出非洲》和《芭贝特的盛宴》，在她逝世后两部作品相继登上银幕，并获奥斯卡奖。在凯伦与托基尔德的约定里，二人中若有人去世，另一人便要负责将二人的契约告诉世人。而在履行信誓的过程中却波折不断，影片戏剧张力逐步被拉至极限，性别、伦理、艺术……逐渐走向失控的人物处境与相互博弈的角色关系，在此部作品中得到了各种维度的展现。

“我承诺，我将永远守护你、时刻为你在这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甚至在绝望的时候可以朝我的窗户扔石子。最重要的是，你必须保证永远信任我，努力成为你命中注定的艺术家。”这个誓言不仅贯穿了整部影片，甚至突破了

时空的限制，成为了丹麦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历史的线索。托基尔德在凯伦的人生情感生活中扮演了最后一段重要的角色。1948年，当凯伦遇到托基尔德时，她已经64岁，正遭受三级梅毒和衰老、焦虑的摧残。而与她这位30岁诗人的关系尽管激烈与消耗，却始终保持着柏拉图式的存在。托基尔德被这位年轻女性巫般的魔力所吸引，全身心地投入到她提出的“契约”中，承诺为艺术放弃一切。然而，这种占有与交换式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负担与侵噬。《信誓》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悲剧性的、难解的情感故事，同时也是作家

在现实生活与艺术创作中互相关联、统治的写照，尤其探讨了人在实现其作为艺术家的全部潜力方面愿意走多远的两难处境。

## 戏剧性关系：多重存在的博弈

在《信誓》中，故事的核心看似是凯伦与托基尔德的誓言，但是誓言两端真正用力的人却不是他们，而是凯伦与诗人的妻子格蕾特。影片的开始，托基尔德一无所有，被

对于暮年的凯伦来说，她辉煌的文学成就依然不能消除她彼时的病痛、孤独与焦虑，她需要托基尔德作为自己的精神伴侣和继承人，因此以自己的观念雕琢、操控布里克森，不断地在引导与依赖、鄙夷与欣赏、对峙与合力等复杂状态之间横跳，这一过程中，凯伦的自我投射相当显著。对于格蕾特来说，作为图书管理员，她对文学抱有天然的尊敬；作为妻子，她也自然期待丈夫能够在这位文学巨星的指引下取得进步与成功。但是，这愈发诡异的信誓让丈夫逐渐远离家庭生活，自己也因此失去对原有关系的掌控。

如果说影片前半部分的重心拉扯更趋向于单轨运行的、尚能预期的不祥，那么在影片后半部分，第三位女性角色贝内迪克特的情感闯入则直接引发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别处的危机，而这意外本身是由凯伦召唤而来，最终又使得凯伦不安并加以嘲弄，因此为影片带来了更为复杂与矛盾的构造。最终，贝内迪克特选择坦白离开，格蕾特自杀未遂，凯伦则提出解除信誓，故事似乎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境地。尤其当这位年轻的诗人接受解除信誓时，凯伦在讶异与痛苦中拿出了猎枪瞄准了她，而他平静地上前、俯身吻了她的嘴唇——此时，影片迎来了真正静妙的高潮，这一幕堪称对两人长久以来复杂关系的绝妙注脚。

## 书写内外：自我与文化意识

在《信誓》中，有关书写内外的自我存在也是影片探讨的重要主题。

丹麦有一个术语叫“Janteloven”，英文是“Jantes Law”，它描述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不应该因为能比别人不能做的事就认为自己更优越。《信誓》所呈现的纠结就是我们是否应该为了实现伟大而作出牺牲。

因此，这部描述了丹麦文学史上重要片断的电影以一种真正令人兴奋的方式挑战了我们的文化意识。它同时也探讨了创作与创作者自身的关系，即究竟是作品需要作者、还是作者需要作品。创作者对这一答案的找寻贯穿了影片，使得故事具有了一种层层嵌套的元结构，如同雕刻自身的雕塑，作者书写着作品，而与此同时作品也书写着作者，被书写的对象企图以自己的意识而改写、统治作者。作者不断地游走于书写内外的走向，而自身又同时深陷它们。托基尔德是作品的上帝，同时也付出自己的生活、成为了作品的殉道者。

在激烈的戏剧冲突中，我们看到《信誓》导向了一种宁静的意外：格蕾特自杀未遂后在病房里读凯伦的书，读到了她的生命力与痛苦，并认识到不是托基尔德需要凯伦，而是凯伦需要她。这一曾经处于激烈博弈关系中的女性在此刻却理解了她的“敌人”，仿佛生在生死交界地带，人们如同赤裸的幽魂，只有互相承认，而这一切依然是通过真诚的作品与阅读实现的，书写的意义再次被延伸。因而影片的末尾，飓风过后是一片宁静温暖的图景，托基尔德与妻儿在美丽的草坪上嬉戏，这个纠缠复杂的大命题终究迎来了暂时的安眠曲。

(作者为青年影评人)